# 叙事、资本与权力：AI 时代的产业政治经济学

## ——从一场科技风波透视现代治理的多重命题

**摘要**：本文以 2026 年 11 月围绕某全球 AI 芯片龙头企业管理层震荡及其关联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的一系列公开报道与披露文件为分析样本，尝试将这一事件置于产业政治经济学的多重理论框架下加以考察。本文依次讨论五个相互关联的命题：其一，“末日叙事”作为一种话语资源如何与”监管俘获”策略相结合；其二，商业媒体的股权结构、流量逻辑与议程设置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其三，IPO 锁定期安排、内部人减持与供应链担保作为资本市场信号的理论含义；其四，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与市场化定价机制设计；其五，“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张力，以及领导力与制度、发展道路多样性等更为宏阔的治理哲学问题。本文的所有事实性陈述均以公开报道与监管文件为依据，对尚存争议之处均作归属化表述；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任何个人或机构作出评判，而在于借此案例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与治理命题。

**关键词**：监管俘获；议程设置；信号理论；循环融资；数据产权；制度化腐败；治人与治法；路径依赖

---

## 一、案例背景：一桩科技风波所折射的系统性问题

2026 年 11 月，全球 AI 算力领域发生了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事件。据多家国际媒体报道，某芯片龙头企业的创始人在”国家安全疑虑”与”公司治理争议”的双重压力下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几乎与此同时，一家与其存在密切商业关系的大模型企业在估值预期大幅下调的情况下推进上市，其招股书披露的关联交易、政治支出、锁定期安排与巨额算力采购承诺，引发了市场的广泛讨论。

围绕这一事件，公开信息中呈现出若干值得深究的线索：据《纽约时报》、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新加坡执法机构曾对一家相关算力企业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调查，最终以”证据不足以提出刑事指控”结案；据华盛顿方面披露的信息，情报评估文件在呈报过程中的措辞变化受到国会与舆论关注；另据美国参议院游说披露档案与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开数据，相关企业在 2025—2026 选举周期的联邦游说支出与政治捐赠出现了数倍增长。上述事实的细节与因果链条仍在各方核实与争论之中，本文不对具体事实作终局性认定。

然而，无论这些指控最终被证实或证伪，这一事件作为一个”案例样本”，已经为我们观察当代科技产业、资本市场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极为罕见的透视窗口。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当代技术资本主义体系中，叙事、资本与权力是通过怎样的机制相互转化、彼此强化的？**以下各节分别展开。

## 二、叙事政治经济学：末日话语与监管俘获

### （一）“末日叙事”的估值功能

在 AI 产业的融资实践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部分企业在面向公众与政策制定者时，倾向于强调其技术的”危险性”与”颠覆性”——模型能力被描述为接近战略武器的水平。从传播学与金融学的交叉视角看，这种”末日叙事”（doomsday narrative）并非单纯的风险警示，而具有明确的资本功能：在风险投资的定价逻辑中，“技术足够强大到足以构成系统性风险”与”技术足够强大到足以支撑超高估值”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叙事越惊人，注意力越集中，融资溢价越可观。

这一机制可以被视为”注意力经济”在金融市场的延伸。当技术评估高度专业化、普通投资者与监管者难以独立验证时，叙事本身便成为定价的核心变量——这正是金融学中”叙事经济学”（Narrative Economics，席勒）所描述的情形：故事的传播力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压倒现金流折现的冷峻计算。

### （二）从叙事到立法：监管俘获的经典剧本

然而，叙事的功能不止于融资。产业组织理论中有一个成熟的概念——**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斯蒂格勒，1971）：在位企业有动机推动政府设立高昂的行业准入壁垒，因为合规成本对资金雄厚的在位者而言只是固定开支，对潜在挑战者却是灭顶之灾。

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当前 AI 产业的政策游说实践，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策略结构：

1. **需求制造**：通过末日叙事塑造”AI 必须被严格管制”的公共舆论；
2. **规则设计**：推动算力准入许可、强制审计、硬件追踪等合规要求——这些要求对头部企业是成本，对初创企业与开源生态则是壁垒；
3. **利益闭环**：监管壁垒确立后，在位企业的市场地位获得制度性保护，前期投入的游说支出转化为长期垄断租金。

公开游说档案显示，2025—2026 年间多家头部 AI 企业的联邦游说支出呈数倍增长，重点游说法案涉及芯片出口管制与硬件追踪条款。从产业政治经济学的标准视角看，无论游说的主观动机如何表述，其客观效果都符合监管俘获模型的预测：**最安全的市场地位，不是技术领先，而是由法律保证的领先**。

需要指出的是，对 AI 风险的审慎评估本身具有正当性——任何具备广泛外部性的技术都需要公共治理的介入。真正的问题在于议程的制定权：当”安全”议题的定义、证据与解决方案主要由利益攸关的在位企业供给时，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便趋于模糊。这正是监管俘获理论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新形态。

## 三、媒体、资本与议程设置

### （一）商业媒体的结构性约束

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早已指出：大众媒体未必能决定人们”怎么想”，但能显著影响人们”想什么”。在本案例中，主流媒体对相关事件的密集、连续、多平台报道，客观上构成了舆论形成的关键变量。

理解这一现象，需要进入媒体机构的治理结构层面。以美国主流大报为例，其公司治理普遍呈现出两类特征的叠加：其一，部分报业集团采用双重股权结构，超级投票权股份集中于特定家族信托，保证了编辑方针数十年如一日的连续性；其二，流通股高度集中于大型资产管理机构，广告与订阅收入则深度依赖大型企业客户与机构订户。这种结构并不意味着具体的报道必然受到直接指令干预——现代新闻机构普遍设有采编与经营的制度性隔离——但它意味着，**选题的优先级、资源的配置方向与叙事的总体框架，不可能完全游离于所有者结构与市场环境所构成的激励体系之外**。

### （二）调查新闻的双重属性

跨国、跨年度的深度调查报道，单项目成本可达数百万美元量级。从媒体经营的角度看，如此高昂的前期投入必然要求最大化传播回报——全平台推送、播客联动、多语种版本，都是回收成本、扩大声誉的常规运营手段。这是新闻专业主义与商业逻辑相互交织的常态，本身无可厚非。

但批评者——包括媒体研究学者与部分科技行业人士——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当调查报道的选题恰好与特定利益集团的政策议程高度同频、报道时点恰好落在立法博弈的关键窗口、叙事框架恰好与特定游说网络的公开主张高度吻合时，公众的质疑并非全无道理。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环境中，**新闻的客观性不仅取决于每一个事实是否准确，还取决于事实的选择、排序与投放时机**——而后者恰恰是外部观察者最难验证的环节。

这提示我们：在当代信息生态中，媒介素养的核心不再是"辨别真假信息"，而是"理解信息供给背后的激励结构"。对任何单一信源——无论其品牌多么权威——保持结构性审视，是独立判断的第一课。

## 四、资本市场的信号与纪律

### （一）锁定期安排：最诚实的"测谎仪"

金融经济学的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斯宾塞，1973）为解读 IPO 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 costly action（有成本的行动）比廉价的言辞更可信。** 创始人对企业长期价值的真实信心，无法通过路演言辞验证，但可以通过其股权处置行为观察——因为减持决策直接以其私人财富为代价。

IPO 研究文献中有一个成熟的经验发现：锁定期（lock-up）的长度与内部人减持节奏，与上市后的长期股价表现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标准的 180 天锁定期安排，其制度功能在于为二级市场留出业绩验证期；反之，若一家企业在上市首日即允许创始人团队大规模减持、并设置高频次的后续解禁窗口，则无论其公开叙事如何乐观，其筹码结构本身就在传递相反的信号。

进一步地，当一级市场估值在路演过程中被迫大幅下调——本案例中，据公开报道，预期估值区间下调幅度达数千亿美元——这同样是机构资金"用脚投票"的定价信号。发行价从来不是卖方意图的体现，而是买卖双方力量对比的真实记录。

### （二）循环融资与供应链担保：繁荣的信用基础

本案例更深一层的金融学含义，在于所谓"循环融资"（circular financing）结构：上游供应商向下游客户提供股权投资或信用担保，下游客户再以获得的融资采购上游产品——收入与融资在同一体系内循环。

这种结构在景气周期中可以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反馈，但其脆弱性也是结构性的：据公开披露，部分 AI 企业的长期算力采购承诺达数千亿美元量级，而其收入端以按量计费为主、长期合约覆盖率有限。金融学上将这种结构称为**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负债是刚性的、长期的，收入是弹性的、短期的。一旦增长预期逆转，担保链条的每一环都会从"增信工具"转化为"风险传导管道"。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体系在这一链条中的角色。商业银行的风控逻辑要求借款人具备可验证的偿债现金流；当借款人无法独立满足这一条件而必须依赖第三方巨头担保时，担保本身即构成对底层资产质量的某种"间接否定"。这为外部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简洁的判据：**观察一个产业的信用质量，与其看估值，不如看它在无担保条件下能以什么成本融到债务资金**。

### （三）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的序贯逻辑

企业融资理论中的"优序融资假说"（pecking order theory）指出，企业通常优先使用内部资金，其次债务，最后股权。但对于高风险的未盈利企业，序贯方向恰好相反：先以股权融资吸收风险，待商业模式验证后再进入债务市场。当一家尚未建立稳定正向现金流的企业被迫大规模转向债务融资、且需要供应商担保才能成交时，往往意味着股权资本的边际供给已经趋紧——风险投资受限于基金规模与出资人回报压力，无法无限承接指数级增长的资本开支。

由此可以理解 IPO 时点的选择逻辑：当一级市场股权资金趋紧、债务融资依赖担保、而估值叙事仍处于高位时，尽快登陆公开市场、将筹码分散至更广泛的投资者群体，便成为内部人眼中"最后的最佳窗口"。这一逻辑本身是中性的资本市场规律——它既不证明企业必然失败，也不证明估值必然虚高；但它提示投资者：**发行时点本身就是内部人信息优势的一种表达**。

## 五、数据要素的产权与定价：从"圈占"到"交易"

本案例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关于数据获取方式的行业争论：是通过模拟人类浏览行为绕过平台规则获取数据，还是通过明码标价的授权接口购买数据？

这一问题在制度经济学中有清晰的对应框架。互联网早期的内容生态建立在一种默示的互惠安排上：搜索引擎抓取内容，作为交换为网站导入流量；流量再经由广告变现。当 AI 应用直接消化内容而不再导流时，这一互惠安排被打破，内容生产的外部性随之显现——创作者承担了生产成本，却无法分享下游收益。若外部性长期得不到内部化，理性网站的最优反应是关闭公开访问，最终整个公开语料生态趋于枯竭。这是典型的"公地悲剧"结构。

破解之道在于产权界定与交易机制的制度设计。近年来出现的"按次抓取付费"（pay-per-crawl）机制，本质上是科斯定理的工程化实现：通过为数据抓取权设定明确产权、辅之以低成本的交易基础设施（身份核验、自动计价、实时结算），使外部性得以通过市场价格内部化。这一机制的经济学优点在于：

- **价格发现功能**：高专业价值的内容获得高定价，激励优质供给；低价值内容以低价或免费流通，各得其所；
- **效率筛选功能**：付费机制迫使需求方放弃"蝗虫式"全量抓取，转而精确采购真正有价值的数据，反过来提升了模型训练的数据质量；

- **生态可持续功能**：内容生产者获得新的收入渠道，公开互联网得以存续，形成"创作—定价—交易—再创作"的正循环。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是数字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当某种生产要素从"可以免费圈占"转向"必须付费购买"，恰恰标志着该要素市场走向成熟**。数据要素的市场化定价，与土地、资本、技术市场的历史演进遵循同一逻辑。

## 六、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制度化腐败之争

### （一）"合法"的边界

本案例中另一类引发广泛讨论的现象是：某些利益安排——如高管通过私人基金投资外部企业、再由其主政的平台向被投企业输送大额订单；又如企业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向立法者输送政治献金并推动有利于自身的立法——在经过董事会报备、信息披露等程序后，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确实难以被追责。

法律经济学家劳伦斯·莱西格将此类现象命名为**"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 corruption）**：当一个制度的运行结果系统性地偏离其宣称的公共目的，而这种偏离本身完全合法时，腐败便不再是个人品行的瑕疵，而是制度设计的产出。支撑这一状态的法律基础设施包括：公司法中的"商业判断规则"（法院原则上不审查经适当程序作出的商业决策）、宪政判例将政治支出纳入言论自由保护、以及刑事腐败定罪对"明确对价交换"（quid pro quo）证据的高门槛要求。

### （二）程序与实质的千年辩题

"程序正义优先还是实质正义优先"，是法学中最古老的争论之一。程序正义的辩护逻辑是坚实的：程序是对抗任意性的堤坝，若无程序约束，"实质正义"将沦为主权者个人意志的代名词。但批评者的反驳同样有力：当程序的制定与适用本身被资源雄厚的一方系统性塑造时——独立委员会的人选、信息披露的格式、诉讼的成本门槛——程序便可能从"弱者的堤坝"异化为"强者的护城河"。

跨法域的比较观察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讨论。不同法域在"形式合规"与"实质审查"之间选择了不同的平衡点：有的法域强调程序公开与事后市场惩戒，有的法域则对关联交易采取"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式审查。两种取向各有其制度成本——前者可能容忍合法外衣下的利益输送，后者则对监管者的能力与自律提出极高要求。制度比较的学术价值不在于宣布孰优孰劣，而在于揭示：**任何治理体系都必须在"规则的刚性"与"执行的实质判断"之间作出取舍，而取舍本身即反映了一个社会关于权力信任的深层结构**。

## 七、领导力与制度：治人与治法的再审视

### （一）"徒法不足以自行"

中国先秦思想家荀况在两千多年前即提出："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这一命题在当代组织理论与国家治理研究中不断获得回响：制度是静态的规则集合，其生命力完全依赖执行者的意志、能力与决心。

历史的经验证据俯拾皆是。同一套成文法度与官僚架构，在不同掌舵者治下可以产出截然不同的治理绩效——文景之治与汉元帝的衰微同处一制，开元盛世与天宝之乱同奉一律。

企业史亦如是：同一套公司章程，在卓越创始人手中是凝聚共识的蓝图，在平庸的治理结构中则沦为派系倾轧的工具。

西方政治思想中与"治人论"对应的是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历史在关键时刻由伟大人物的决断所塑造。其对立面则是制度主义传统：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强调，非人格化的规则体系才是长周期繁荣的基石，因为它降低了交易成本、稳定了预期、使繁荣不必寄望于"明君"的偶然出现。

### （二）两种传统的当代和解

当代治理研究正在超越这一古老对立，形成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认识：

**其一，领导力决定制度绩效的上限，制度决定治理的下限。** 卓越的领导者以远见与魄力打破僵局、开创局面；而制度的价值在于，当掌舵者平庸时，社会仍能维持基本运转而不致瞬间失序。

**其二，变革时刻与常态时期遵循不同逻辑。** 在打破旧格局的非常时期，集中的决断力是稀缺资源——冗长的协商程序在危机中可能意味着机会的永久丧失；而在常态运行期，规则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则成为降低社会摩擦成本的关键。任何成熟的治理体系都需要在两种模式之间切换的能力。

**其三，领导力的最高形态，是将个人意志转化为制度化能力。** 真正持久的变革者，不仅以铁腕破局，更在破局之后将成果沉淀为不依赖个人的组织规则——使"治人"的成就经由"治法"得以延续。反之，若变革成果始终系于一人之身，则"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循环难以避免。

这一综合视角同样适用于企业治理：创始人权威的正面是战略定力与执行效率，其风险面则是关键人风险与继任不确定性。优秀的创始人会主动建设"使自己不再不可或缺"的组织能力——这或许是对"治人"与"治法"辩证关系最现代的商业诠释。

## 八、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对"单一模板论"的反思

本文讨论的最后一个命题，关乎制度的可移植性。20 世纪末曾一度流行的"单一模式普适论"——认为存在一套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标准制度配方——在随后数十年的全球发展实践中遭遇了系统的经验反驳：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在机械移植外来制度后，并未获得预期的繁荣，反而陷入治理失衡与社会撕裂。

发展经济学对此的解释日趋成熟：制度不是可以脱离土壤独立存活的插枝，而是与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发展阶段深度耦合的生态系统。同一规则在不同条件下方差极大——这正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与"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研究的核心发现。成功的现代化案例，无一不是在吸收外部经验的同时，立足自身条件进行制度创新的产物。

这一认识具有双向的含义：它既反对将某种特定模式奉为全球标准答案，也反对以"特殊性"为由拒绝对治理绩效的客观检验。制度的最终裁判标准始终是实质性的——能否维持社会稳定、推动技术进步、改善民生、应对危机。鞋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脚知道；但脚是否走远路，路程本身会给出答案。

## 九、结语：独立判断作为现代素养

回到本文的分析起点。一桩科技产业风波之所以值得从学术角度反复审视，不在于它的戏剧性和具体人事，而在于它像一束探照灯，同时照亮了当代政治经济体系的多个剖面：

- 叙事如何转化为估值，估值如何转化为游说资本，游说资本如何转化为立法议程；
- 媒体的所有权结构如何塑造信息供给，信息供给如何塑造公共判断；
- 资本市场的筹码结构如何比任何路演辞令都更诚实地传递内部人的真实预期；
- 要素定价机制的市场化设计如何决定一个生态的可持续性；
- 程序与实质、领导力与制度、模板与适配等古老命题，如何在最新的技术语境中再度现身。

面对这样一个叙事密集、利益交织的世界，个体最可靠的防线并非某一特定的立场，而是一种方法：**穿透叙事看激励，穿透激励看筹码，穿透筹码看现金流；对一切权威信源保持结构性审视，对一切宏大宣称要求可验证的证据；先弄清世界如何实际运转，再讨论它应当如何改进**。

历史从不奖励喊得最响的人，而奖励看得最清、走得最稳的人。技术会更迭，公司会兴衰，制度会演化，但尊重事实、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这些朴素的品质，始终是穿越一切周期的通行证。

---

*说明：本文为一篇基于公开报道与制度分析框架的评论性学术文章，文中涉及的个案事实均来自公开媒体报道与监管披露文件，对相关争议性表述均已作归属化处理；文中观点仅为学术探讨，不构成对任何个人或机构的指控，亦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